

《后西游记》与晚明文人价值观的变化趋势

刘丽华

(西北政法大学, 陕西 西安 710063)

[摘要]《后西游记》是《西游记》续书中影响较大的一部,虽然沿袭了神魔小说的题材,但是它却和现实贴得很近。作者利用西游故事传达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,代表着晚明文人的价值观。小说抨击虚伪道德,否定救世的可能性,价值观的最终走向是消极的,而经济发展、社会风气以及思想界的活跃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。

[关键词]《后西游记》;晚明文人;价值观

[中图分类号]I207.41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18-0056-04

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对《后西游记》内容有简单的介绍:“《后西游记》六卷四十回,不题何人作,中谓花果山复生石猴,仍得神通,称为小圣,辅大颠和尚赐号半偈者复往西天,度求真解。途中收猪一戒,得沙弥,且遇诸魔,屡陷危险,顾终达灵山,得解而返。”作为续书,《后西游记》的艺术成就难与《西游记》相比肩,因此,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,然而我们必须承认,除了作者在艺术造诣上存在差异之外,他们的创作心态也有着很大的不同。《后西游记》也是神魔小说,但是似乎少了许多娱乐性,求解四众行在孤山野林,却步步没有走出世俗的困扰,处处看到的是人间丑态。这说明《后西游记》的现实性在加强,尽管它和《西游记》有着相似的情节结构,但续书传递的现实关怀要浓得多,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晚明文人价值观念在发生着变化。

一、伪道德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

一切阻挠西行求解的人和妖构成了《后西游记》的妖邪世界,这个世界中的大部分都是以“圣人”、“尊者”的庄严姿态出现,来掩饰其妖邪的本质。

全书一共四十回,从开篇到第十六回,求解四众会齐;从第十七回到第三十九回,达灵山得真解。其间描写了大小磨难15个,用两回以上篇幅来重点描写的大难有6个,除黑风鬼国是前代仇怨所招之外,余者都是作者自己的创作,是求解途中的主要劫难,而它们全部关涉名利和欲望。

求解之前,受天子尊重,众人敬仰的生有法师是公认的“德高望重”之人,每每登坛讲经,景象壮观,“不一时,那些听讲的挨挤而来,何止百百千千。也有乡绅学士,也有公子王孙,也有富豪财主,也有商贾农工,也有深闺女子,也有孀妇村姑,不分男女都夹杂一堂,守候登坛”。崇高的道德具有巨大的号召力,这里不单是对佛法的信仰,更是对德者的崇拜。其实这个法师却是空有德者之名,不解真经,怂恿皇帝迎佛骨,诬民惑世,赚得“钱财山积,米谷川来,金玉异宝,绫罗锦绣”,还得一个“视如粪土”、“制作寻常”的美名。这是全书开篇的第一位尊者,就是一个以道德为名利作幌子的妖邪。

求解途中,所谓的解脱大王、文明大王、冥报和尚道行各不相同,却无一不是披着道德外衣的妖邪,分明是害人性命,掠人钱财,却要找一解脱天下众生、开文明世界的道德目标作辩护,一个个无辜生命的葬送成全着一个个虚伪的德者。《西游记》中的妖怪有的凶狠,有的狡猾,却都有着各自原形的本性,那是一种自然本性,熊有熊的憨、虎有虎的猛、兔有兔的狡,都是一些单纯的妖怪。而《后西游记》中的妖邪身上却多了份虚伪,这虚伪不是源于自然,而是来自人间,来自晚明社会。这一点在文明天王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文明天王浑身布满金钱,手拿文笔,以文明教化百姓,他把自己打扮成继往开来的“天王”、“圣人”,摆出“圣人言”的姿态,分明有着儒教教化的特征。文明天王自己说得明白:“我也不用刀剑杀你,

只将文笔书你做妖僧，写你坐外道，几个字儿，压得你万世不能翻身。”“春秋之笔”不再是“立言”成就不朽的工具，而成为杀人的武器，可以变善为恶，变坏为好，任由人来颠倒是非对错。另一方面，文明天王又用钱财筑起不可一世的势力。一颗金铤压得大颠和尚抬不起头来，钱势是打击、欺压对抗穷土的又一法宝。文笔可怕，金铤可怕，文明更可怕。道德文明在这里成了一种不可超越的势力，以压制异己为目的，支撑的不是善而是恶，人们生存在这样的文明社会中，却要体验着难以忍受的压抑和排挤，这是对时代特征有敏锐感受的文人的切身体会。

显然，作者借用神魔故事在讽刺道德，揭露它的虚伪，这是传统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标志。自从汉代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之后，以道德价值为取向的价值观日趋加强，并且和士人的政治生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纵然朝代更替，政权改变，道德的地位始终没有发生变化，它被统治阶级利用起来，培养出大批“忠君护道”的封建知识分子。传统的价值观深植在他们的内心，他们努力地“立言”、“立功”、“立德”，以实现人生价值的不朽。道德价值观实际上帮助君王达到了笼络和辖制读书人的目的。《后西游记》产生在晚明，书中对道德这一最高的价值目标产生了怀疑。作者笔端不离释教佛法，墨迹总在山林野村，却处处在写世俗儒者，徒有名望的妖邪有着许多的拥护者和信徒，但是他们却是假道学的象征。解脱大王立下宏愿解脱众生，不过在掩饰他的伤生害命；冥报和尚自立新政，颠倒是非；文明天王的笔也不能真正传达圣人之意，妖邪都在标榜道德，可那已经不是真正的德，“立言”、“立德”通达不朽的途径就这样被否定了。真的道德不传，虚伪的道德在吓唬、欺骗着人们，于是不断有人利用“德”来骗名骗利，《后西游记》把伪道德归入妖邪一类，说明晚明文人已经对伪道德失去崇拜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利用道德成全一己之私的愤慨。

老婆婆的贪欲在为那些慕名利的妖邪做着脚注，造化小儿的圈圈无疑是作者向世人提出的警告。名、利、富、贵、贪、嗔、痴、爱、妄想、骄傲、好胜等等，都已经成为人们精神的桎梏和诱惑，束缚着所有的人。《后西游记》不过是用想象将妖邪与现实相联系，作者把伪道德的泛滥归结在世人的贪名好利上，同

时又看到它助长着人们的贪欲，伪“德”、妄“言”欺诈、诱惑众生和蜃气造出虚幻美景诱食行人没有区别。

妖邪世界不堪小行者的金箍棒，为追名逐利而存的道德不足以作为人生的价值去追求，价值目标的否定、传统观念的削弱，反映出晚明文人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，尽管他们怀疑道德的真实性，但他们仍然恳切呼唤真道德，并不曾抛却济世救人的责任感。

二、求解救世与平心自救

唐僧取经是为解度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，但真经取回却没达到解救的目的，反成为伪道德者的摇钱树。这正是大颠和尚西行求解的起因，所以，再度求解是改变现实、解救众生脱离苦难的救世之举。

求解四众在伟大目标的指引下克服艰险，预示了救世之路的艰辛，这一点并未对《西游记》作出突破，只是让我们看到救世是任何时代文人的共同责任和理想，这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延伸，是道德责任感的必然。然而，《西游记》是一路豪歌向天涯，取得真经返东土，四众均得正果，救世的理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达到了完美的统一，传达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。《后西游记》却在不断地否定着救世的可能性。

全书一开始便对取经救世的实际效果作了否定。取经之功被不有法师所代表的伪道德抹煞，那么求解的结果又如何呢？一片喜气获得真解的最后一回，当众讲真经“一时佛法清景，至于不可思议”之时，作者写道：“不期穆宗晏驾，敬宗即位，不知留心内典，就有不肖僧人，附和着乌漆禅师，高扬宗教，败坏言论，虽闻有智能高僧，讲明性命，却又隐遁深山，不关世俗，所以渐流渐远，渐失其真，这是后话不题。”仅这几句话就交待了求解的结果其实与取经的结果无异。那么一路艰辛，努力西行，都成了无用功，救世的理想终归没有实现。尽管大颠和尚师徒四人成佛，只能是个个人价值的实现，完成的是自救。《后西游记》不仅消解了取经之功，也消解了求解之功，表达着对改变现实可能性的失望，隐藏着消极的无奈。

从人物的身上也透露出这样的无奈。不可否认，孙悟空是个英雄，是世人理想中除魔救世的英雄，文人创作《后西游记》时仍然希望这样的英雄存在于人世间，所以，小行者的形象继承了孙悟空所有的本

领,甚至在悟性上更高出悟空一筹,性格上少了些急躁、添了些稳健。唐半偈是具有真德行的高僧,较取经的唐僧更加智慧开明,他一路西行传道布德,但他们和取经师徒一样,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救世的任务,不是不想,而是不能。除魔纵然不辞辛苦,但魔幻总不能尽除。不老婆婆触死山崖,却跑出无数女子拾了玉火钳的碎片而去,小行者预见到要“传流后世,又要造无边孽障”;冥报和尚以邪代圣,到被小行者戏语点破气急而死,仍无悔意。唐半偈感慨:“留他可知无益,只可怜他死便死了,尚迷而不悟。”所有的伪道德都有一大批拥护者,尽管他们是虚假道德的受害者,但是他们的无知和盲从却给揭穿伪道德者的假面具带来了困难,更可悲的是这些拥护者中,有许多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追随的道德是虚假的,“只因拗他不过,不敢倡言”。面对诸多无力抗拒诱惑的世人,徒有救世英雄之名又有什么作用呢?这是救世者的无奈,亦是有着救世之心的一代文人的无奈。

《后西游记》在讽刺伪道德的同时,反映出了作者对传统价值标准的怀疑。用传统价值观来看,求解救世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正途,但是求解的最终结果并没有能够解救众生,贪婪的仍然贪婪,虚伪的仍然虚伪,正应了如来的话,“求去了与不求去一般”,求解的行为只是使唐半偈师徒四人得成正果,实际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集体价值的实现发生了分离。从另一方面来看,文人意识到了个体存在同样具有意义,但并不能认为他们在否定传统的价值标准。准确地说,文人依然认可传统的价值标准,只是标准的过于理想化使其可望而不可及,不能达到标准的无奈使他们产生了怀疑和困惑,转而关心自身的存在价值。求解救世的目的使人们免堕贪嗔,而求解的最大阻碍却恰恰是人的贪痴肆虐,纵容世事偏颇。显然,在伪道德和名利之欲充斥的混沌世间,人们惟一可以拯救的是自己。尤其对于有着强烈救世责任感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,这才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。

与取经师徒相比,求解众人在西行路上遇到磨难时的态度要冷静得多,心志的清醒和坚定被强调为克魔的必备条件。半偈和尚被魔所擒,“端坐不语,互心不迷”,一戒却听的妖怪花言巧语,“满心奇痒,软瘫做一团”。抗拒妄言和诱惑,需要明辨是非。小行者初被造化小儿的好胜圈所套,逃离的方法不过是平

心而已,小行者以铁棒降魔,众人守住本心避魔。在作者眼中,人们之所以被妖邪所缠,不过是自己的欲望太重。看起来似乎在宣扬释教的清静无碍,其实紧扣着《西游记》中提出的“心生种种魔生,心灭种种魔灭”的思想。《后西游记》把这一点作了更突出的强调,认为这是行之有效的自救之法,时常在小行者的言辞和诗评中看到有关议论。事实上,作者把伪道德的泛滥、妄言的流行都归于名利之欲的结果,妖邪难灭,世俗道德继续沦丧,没有救治的可能,救世者可以解救的只有自己,碌碌的人群不能辨是非、抗诱惑。所以,我们能感受到忧心忡忡的氛围笼罩着全书。

《后西游记》早已失去了《西游记》的豁达和乐观精神,它没有沿着浪漫主义走下去,而是接着神魔小说的形式为变形的人间写实。作者更看重的是西游故事的影响力和利用神魔小说言说的安全性,传达出的郁闷和情绪不是个人化的,而具有时代的普遍意义。《后西游记》已经不再崇拜和相信虚伪的道德,文人转而守护自己的心灵,希望以此来抗拒名利之诱,虽然看到了个体价值在集体价值之外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实现的可能,但是找到这样一条自我精神净化和超越的途径,却是以救世责任感的严重挫败为代价的,价值观的最终走向是消极的。

三、影响文人价值观变化的因素

《后西游记》所表现出来的文人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现象,联系着诸多因素。

首先,从时代来看,《西游记》成书在明中期,虽然我们还在争论它的作者问题,但是可以肯定,文人是它的创作主体。从西游故事的发展到《西游记》的成书,经历了漫长的过程,它不断地被改编和再创作,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某个人的,而是包括了明之前许多朝代文人群体的共同心理。《后西游记》不知何人为其作者,但其出现在明代晚期,更多的代表了作者生活时代的文人心态。商品经济在明代迅速发展,到明代晚期,商业的繁荣直接刺激了城市的发展,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,物质欲望大大增强,追慕奢华生活成了社会风气。富足的物质基础滋养出了一大批终日游逛酒肆的寄生虫,繁

荣的市井文化提供着诸多的游乐场所，热闹昌盛的城市自然是物质丰富的结果，但其背后却是精神的日渐颓废。世俗文化是奢侈之风日盛的产物，迎合着上层社会耳目之需的发展。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，人们对金钱物质的渴望取代了对道德的崇拜，世俗对于个体价值的衡量标准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，更加重视人的财势，而才识的地位却在悄然引退。

其次，从心理角度看，社会风气对读书人的影响是难以抗拒的。“人是孤单的，但同时又与外界发生关系。他之所以是孤独的，是由于他是一个独特的整体，与其他任何人都不一致，并且又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，当他不得不只靠自己的理性力量作判断，下决心时，他必然是孤独的。然而，人又是不能忍受孤独的，不能与其同胞隔绝。”尽管文人因为自身的修养和责任感让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但是这种属于人类共有的心理是他们无法抛弃的。因此，明代读书人必然要通过改变自己的状态来适应社会风气，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，所以，有一大批读书人积极追逐着名利，结果助长了这一风气的蔓延和肆虐，这显然是对文人胸怀天下、兼济苍生的责任感的严重亵渎；而另有一批读书人抱着理想无法改变，也无法融入现实的心态而产生了深深的孤独感。《后西游记》中大量记述虚伪、贪婪、金钱、道德，显然这些正是社会生活中最能触动作者情感的东西，在它们的冲击下，开始思考生存现状和自我价值，促使了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。

最后，从思想界来看，心学的发展活跃了晚明文人的思想。心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主要活动在正德、嘉靖时期，但他的心学影响真正产生效力则到了晚明，心学的崛起给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。王守仁心学对程朱理学最大的突破是把“天理”拉回人心，提出“心即理也，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”。朱熹的“天理”在人心之外，利于封建统治者把君权推向神圣，而人心一旦被抬高到天理的位置，就启迪人们重新认识君权、道德，确定自己的角色。心学思想形成的契机是社会风气的沉沦道德的沦丧，王守仁深感“今功利之毒，沦丧于人之心髓，而习以成性”，他的本意是在唤醒人们的道德感，重建理想中的君王政治。《后西游记》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正是文人思想觉醒的结果，他们关注自我个体，大胆批判现实，继承着心学的精神，站在时代的高度思考社会、人生，试图以一种清醒的姿态立于教化、名利、欲望的面前，尽管这种清醒带着许多的无奈和失望。正是在心学的引导下，文人对传统道德的态度由单纯的信奉转向了怀疑。

对《西游记》续书的关注不能停留在娱乐功能上，它反映的心态是时代赋予文人的共同特征，虽然晚明文人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新的价值衡量标准，并在旧有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一起破灭的时候，陷入了失望和痛苦，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，他们的消极和一个没落王朝的命运是一致的，是历史前进的必然，也是文人群体成熟的标志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鲁迅.中国小说史略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2]后西游记[M].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88.
- [3]明·吴承恩.西游记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.
- [4]德·埃里西·费罗姆.寻找自我[M].北京:工人出版社,1988.
- [5]明·王守仁.王阳明全集:答顾东桥书[M].北京:红旗出版社,1996.